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 |
|---|---|
| Title | 政治・社会　中国海权困境及其原因对策的相关探讨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 |
| Author(s) | 石, 羽 |
| Citation | OUFCブックレット. 2014, 3, p. 157-176 |
| Version Type | VoR |
| URL | https://hdl.handle.net/11094/27098 |
| rights | |
| Note | |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 中国海权困境及其原因对策的相关探讨
##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

石　羽

海陸複合国として，中国は特定の地政学理論を持っている。東アジアでは，国家間関係が複雑であり，地政学的構造が常に変容してきたので，中国は自国の地政学理論を見直すべきであると考える。歴史上，中国は大陸国家と自任し，シーパワーを全面的に軽視してきた。近年，陸上の安全情勢の改善はシーパワーの発展に良い機会を提供している。また，政府と国民のシーパワー重視という傾向も出現した。一方，中国のシーパワーにとって，理論上及び現実上の様々なチャレンジが存在している。特に，海上領有権の衝突により，中国のシーパワー重視への戦略的な転換は牽制を受け，ジレンマに陥ったと言える。本稿では，まず，地政学理論上及び歴史上，中国のシーパワー，ランドパワー及びリムランドの論争を中国の現状と関連づけて整理し，シーパワーを高める必要性と重要性の根拠を明らかにする。また，中国のシーパワーの内実を理論的· 現実的に分析し，そのジレンマが起こった理由を探る。そうした上で，ジレンマの解決方法，特に，南シナ海海域の危機がエスカレートしている現在，中国の国益と安全を損なうことなく，同時に領土対立の緩和に利する合理的な海洋政策を提案する。

地缘政治学是当今世界大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理论工具。在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亚欧大陆强大的陆权与海权在此交汇，各国基于地缘利益相互角逐，地缘关系极为复杂。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应时常审视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在政策或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对地缘政治的形势，产生变动的原因以及趋势形成客观的政治认知，对地缘政治机遇和风险做出准确预警，引导政府制定合理的中国国家战略。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一直认为大陆空间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海洋只是保障陆权的天然屏障，根本谈不上主动开发和利用海洋。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海洋战略走向全方位的战略收缩。从现实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同陆权和边缘地带的威胁相比，海权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中最薄弱的环节。尤其是近年来南海各国交错的领土主张导致的外交甚至军事对峙威胁着区域安全和稳定。

随着对海洋依赖的加深，优先发展海权已成为社会共识。同时陆上地缘政治安全形势的改善及政府在战略布局上的重视也为海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中国的海权观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海权的现实也面临重重困境。

中国海权困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面对种种挑战该如何走出这些困境？中国该采取怎样的海洋战略？对此，本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海权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思考在海权频频受到挑战的今天，中国该如何解决和应对，为寻找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献计献策。

## １．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分析

### 1）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历史概况

地缘政治学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军事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思想。例如，《战国策》中所记录的战国纵横家所推行的“天下之士合纵与赵而欲攻秦”中的“合纵连横”思想，“结交距离远的国家而攻打临近国家”的“远交近攻”战略等都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典范。当 1901 年瑞典地理学者 Rudolf Jellen 首次提出“地缘政治”这一概念时，在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一直在地缘政治实践中进行着“塞防”与“海防”的论战。

二战期间，地缘政治学作为法西斯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被斥为国际思潮的逆流。也正是在民族危机的二战时期，“战国策派”的学者将地缘政治理论真正引进了中国[(1)]。1943 年，“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在《大公报》主编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的专栏，以英德海陆权之争的现实评估

了二战形势，并对希特勒的“大地政治学”进行了批判。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分别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学者沿着麦金德开创的倾向于考察国家间海陆位置差异的“地理对抗”的思路[(2)]，创立了关注国家间意识形态不同的“分裂带理论”。此时的中国虽未将地缘政治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仍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地缘政治思想。例如，1974 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就突破了按照意识形态类型设定国家间关系的局限。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同时，重视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3)]。中国学者开始脱离英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对抗”的观点，并沿着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线路不断独立完善自己的研究体系。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要求，中国学者广泛探讨了世界范围内诸多地缘政治现象。

但复兴后的中国地缘政治学一直没有克服分布主义地理学的缺陷。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被概括为“政治现象的区域分布、联系和差异”[(4)]，虽然有学者把研究对象拓展为“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5)]，但是由于缺乏对地理空间特征的深入思考，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政治现象的分布上，也并没有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中国需要根据新的战略形势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再启蒙。

**2）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战略**

地缘政治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政治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方案与对策。因此中国要确立行之有效的地缘政治战略，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明辨中国地缘政治的威胁和挑战，才能有的放矢地去寻找一条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确道路。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解体，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中国周边这三个层次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6)]。

首先，在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中，美国在全球层次上把中国定位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挑战”，在亚洲地区层次和中国周边

层次上，通过强化多个双边同盟体系，扩大安全伙伴，在地缘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

其次，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地区权力中心的形成，使得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加剧。这些大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无论从全球还是区域层次上，都将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第三，中国在区域层次上的地缘政治空间不仅在于朝鲜半岛、东盟和中亚地区，在次级地缘政治空间层次上还有日本、南亚、中东和南太平洋地区。东海、南海、台湾问题以及中日、中印、印巴、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潜在对抗都会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区域国家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中国边界地区的稳定。

此外，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仍面临着“台独”、“疆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势力的严重威胁。并且随着核扩散与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凸显，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上述三个层次的危险交织，也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困难与挑战。因此，面对这些挑战和威胁，中国总体的地缘政治战略也是从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来进行规划的。

在全球和亚洲地区层次上，中国需要借助世界上各种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扩张的力量，包括欧盟、俄罗斯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充分利用以联合国为主的各种多边国际制度，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预防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在亚洲地区和中国周边层次上，近年来领土争端日益尖锐。中国虽然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但仍与印度存在边界争端，在东海、黄海、南海与邻国仍存在主权分歧。其中领海争端最为突出，并呈现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趋势。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地缘政治利益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根本前提，因此消除以陆海边界争端为主的各种冲突成为这两个层次战略上的主要议题。

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再启蒙，同样在实践中，中国要实现复兴和崛起，必须从根本上超越自身的地缘局限，巩固和扩大周边地缘安全空间，推动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整合，并借助周边和区域力量，参与全球层次上的地缘政治互动，拓展潜在的地缘政治空间，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 2．中国陆权与海权的地缘政治分析

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特点，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区域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影响深远并成为各国确立其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论依据的三个流派为H·J·麦金德的“陆权论”、A·T·马汉的“海权论”和N·J·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作为海陆复合国的中国，无论是发展陆权还是海权，都能从上述三个流派中找到理论依据。

### 1）中国陆权的地缘政治解析

#### (1) 中国陆权的地理解读

“陆权”这一概念源自英国政治地理学家H·J·麦金德在其1919年发表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的“陆心说”。麦金德认为，世界历史是陆权强国和海权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陆权国家人力物力资源丰富，随着交通日益改善，陆权国家终会压制海权国家。而强大的陆权主要集中在一个海上权力到达不了的重要战略地带，即包括中国的西藏、新疆在内的亚欧腹地。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并强调“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7)]。

可以说，中国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一个有海疆的陆权大国。中国的西北部和北部与亚欧大陆腹地接壤。而中国的西北地区，主要指新疆更是在麦金德所指的“心脏地带”的范围内。这里不但保卫着中国边疆安全和内陆稳定，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还是能源输出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汇集了很多国家的利益，因此被称为“亚洲的枢纽”。正因为这一区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诸大国为了争夺中亚，纷纷对新疆进行颠覆和渗透活动。

而在大国侵略的威胁解除的今天，对于能源需求日益强烈的中国来说，该地区蕴藏的能源，以及作为中亚能源输入的通道，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此外，新疆境内少数民族较多，接壤的中亚国家也是民族宗教问题集中的地区，作为中原安全的缓冲带，新疆的稳定不仅涉及中国自身的安全，还会影响中国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甚至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加上横贯东西的铁路使东部与西部连为一体，因此新疆的安定既是中国陆权发展的关键，也为中国发展海洋经

济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支持。

**(2) 中国陆权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和 2.2 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毗邻，是一个世界级的陆权大国。周边接壤国家有 15 个，这些邻国中有超级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和区域大国等，地缘政治环境相当复杂。

自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陆权发展的机遇主要表现在，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战争的挫折之后，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同时中俄关系的改善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陆权安全趋于稳定。

同时，中国陆权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是当前中国陆权发展的最大挑战。从亚洲地区的地缘形势来看，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弧形地带是美国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战略区域。通过北约东扩、中亚“颜色革命”、阿富汗战争、朝核问题、美日韩军事同盟、美印战略关系等，都可以看出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欲抑制俄罗斯并提防中国崛起的意图。特别是中亚“颜色革命”后美国进驻中亚，间接从陆上控制中亚向中国的石油输出；在南亚，美国与印度关系的提升会影响中印巴三国关系的平衡，甚至南亚次大陆的稳定，同时还有可能控制从波斯湾进入巴基斯坦再到中国新疆的另一条能源通道。

**2) 中国海权的历史与海权安全现状**

**(1) 中国海权的历史解读**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最早的国家。中国的海洋渔业至少已经有 7000 多年的历史。1405 年-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成为中国航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但是最早走向海洋，并不意味着具备海洋民族应具有的海权意识。正是因为海权意识的缺失，中国只是将大海视为地理屏障，而不是把大海看做战略通道和资源宝库，导致了航海技术虽然先进，但由于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航海的经济效益低下，中国的航海壮举只如同昙花一现。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大国不断沿海路来到中国。由于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消

极的海上防御使中国不能形成强大海权，西方殖民主义开始入侵中国。1553 年葡萄牙占据澳门，1642 年荷兰侵占台湾，日本也于 16 世纪开始不断进犯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开始面临海上威胁。于是，在明朝末年中国开始实施闭关锁国的“禁海令”，这一法令一直延续到清朝。禁海令导致了中国与世界脱轨，彻底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航海事业从此衰退。也为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埋下了祸根。

但是真正让政府认识到海权重要性的是鸦片战争。中国在完全没有建立海防的情况下，与一个老牌的海上霸权国交战，其结果是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以及更多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的侵略。一部分有志人士开始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大力倡导提升海防战略地位和发展海军。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然而当时中国的海防主要是迫于外敌的入侵而发展起来的。作为海军发展动力的海外贸易并未发展起来。中国海军也仍旧没有海权战略，而是实施消极的防御战略，最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导致被迫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仅未能实现战略发展与对外开放，还有来自苏联对西北边疆的威胁。中国的防务重点仍然着眼于陆权的稳定。在海洋方面，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孤立中国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中国海军的发展也面临着各种险恶的外部条件，国人海洋意识仍然很淡薄。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军从越南撤军，南海和北部湾海域出现制海权的“真空”局面；中美关系缓和后，美军逐渐退出台湾海峡，台海冲突停息。种种历史机遇都为中国海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奉行的仍然是“近海防御”战略。

**(2) 中国海权现状**

中国的海洋国土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达 1.8 万公里，大小岛屿有 6500 个，海域相连国家有 6 个。但中国海区外侧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东南亚的诸多岛国环绕，使中国海域称为一个半封闭的海域，出海通道受到限制。

首先，黄海为中朝韩三国共有，从未明确划分海域。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韩国与朝鲜纷纷颁布各种法律政令，划定自己的经济水域和开发区，甚至要求按照中间线划界。如果按照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来划分海域，中朝韩势必会出现许多海洋争端。目前中国与朝鲜有争议的海区有 3000 平方公里；与韩国有争议的海区达 17 万平方公里。

其次，在东海海域，除了 1974 年日韩共同划定的“日韩共同开发区”划去了中国东海部分海域外，最大的问题就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不仅涉及到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还牵涉到东海大片海域和大陆架资源的归属，甚至还会在军事上对台湾构成威胁。2012 年随着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再次掀起了中国的反日高潮，使中日两国矛盾进一步升级。此外美日，美韩还多次在黄海、东海举行各种军演，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上安全，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

第三，在南海，自从 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了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并且在南海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对中国的南海诸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甚至控制。时至今日，在归中国管辖的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 150 万平方公里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大部分已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上个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以南海为例，中国实际控制的仅有 8 个岛屿。这些国家还加快了侵占海域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中国的海权受到严重侵犯。

**3）边缘地带理论的历史与边缘地带安全现状**

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 N·J·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和发展。他将麦金德所指的“内新月形地带”扩展到了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地峡两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的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并将这一地带定义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根据这一理论，边缘地带在“海权和陆权发生冲突时，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并可以从海陆两面保护自己”[(8)]。

理论上，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国，既可借助强大陆权向亚欧大陆扩展，又可以借助强大海权进入太平洋。但是这样以来，也会遭受来自亚欧大陆大国和海上大国的双重压力，因此只有海权和陆权足够强大，才能突破陆上大国的包围

与海上岛链的封锁。然而，在当今中国，并不具备共同发展海权和陆权的经济实力和国情基础。而在国力有限，海权和陆权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国家就应当根据国情，来选择海权与陆权的优先性，否则很有可能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边缘地带理论”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制定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优先发展陆权还是海权符合当前的战略形势？在下一章的“陆权与海权”之争的分析中，笔者将探讨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选择。

## ３．中国陆权与海权发展的战略选择

### 1）中国的陆权与海权之争

在中国，一直存在安全威胁并不断承受着外族侵扰的是中国的北部陆疆，而海疆几乎没有遭遇过大规模外敌入侵，因此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中国也很早就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海上力量却非常薄弱。

中国首次处于“陆权”与“海权”两难境地是在晚清政府时期出现的“塞防论”与“海防论”之争时期。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派认识到了“中国西北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主张收复西北边疆，在抵御沙俄等势力入侵的同时，平定内部叛乱，才能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塞防派”的现实依据是：阿古柏挑起叛乱的同时，英俄也加紧争夺中国西北地区。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派则是以鸦片战争和东南沿海日本的侵犯为现实依据，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主张筹办海防，保卫东部沿海的安全。“海防”和“塞防”争论的结果就是清政府制定了“水陆兼防”的基本方针[(9)]。

但最后结果是，“塞防”化解了边疆危机，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占；而海军建设却并没有起到海防的作用，因此中国不但没有形成有效的海权战略，还被列强从海上把中国封锁在亚欧大陆的边缘。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片国土和作为海上防御地带的琉球、朝鲜以及台湾丧失。这些海上战略基地的丢失，不仅把中国通向海洋的通道封锁住，而且还成为今天中国不利的海洋地缘环境雏形。

笔者认为，在当今全球格局中中国仍存在着陆权与海权之争的困境。对海

权或陆权的抉择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作为海陆复合国的中国具有发展海权和陆权的天然优势，因为陆权的发展有“心脏地带”的依托，海权的发展有太平洋广阔的空间。但是，海陆并重的选择则是资源有限国家的劣势，两者均匀发展将分散国家的战略资源。为了使海陆兼备的中国避免出现清朝“海防”和“塞防”之争的两难境地，可以在同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情优先发展一方。笔者认为，当今中国应该把战略方向定位于海权的发展，因为中国海权的发展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

**2）海权发展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第一，海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海权的首要要素—地理位置来讲，对于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和显著海洋性质的国家，海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中国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处。其次，发展海权必然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能御敌于海外，保障国家安全。从海权的安全现状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来自于美国海军。同时，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尚未统一的台湾岛与琉球群岛成为第一岛链上限制中国出入太平洋的关卡；而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美国的战略伙伴则在南海地区有效控制着马六甲海峡。这样就封锁了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因此，突破岛链封锁，确保海洋通道畅通的现实需要要求海权的强大。

第二，发展海权具有历史必然性。

首先，从目前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形势来看，陆权的相对稳定为中国集中发展海权提供了良好的战略环境。当前，中国虽然与南亚邻国之间存在一些边界问题，但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缓冲地带是完整的，在欧亚大陆也没有直接的威胁。西藏不可能获得独立，新疆的疆独分子也只是对中国社会构成一种轻微的刺激，俄罗斯暂时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而朝鲜半岛也没有直接的威胁。而且随着中国继续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中亚诸国以及南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稳定环境将继续得以维持。

其次，相对比中国陆权的形势，中国的海权则面临着诸多威胁和挑战。例如，作为海权依托的领土因素来看，当前中国海上的基本领土主权都得不到保

障，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海权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且由于这些领土争端牵涉的国家和利益非常复杂，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威胁到中国安全及区域稳定。

综上所述，作为海陆复合国的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今天，海洋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托，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然而海权问题已威胁到中国主权完整和稳定。笔者将在下一章里从理论和现状的角度对中国海权所面临的的困境及困境原因进行分析。

## 4．中国的海权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 1）理论上的困境

#### (1) 有关海权的定义

1890 年 A·T·马汉出版了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从此海权问题成为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海权的六大要素："1、地理位置；2、自然结构，包括与此有关的大自然的产品和气候；3、领土范围；4、人口；5、民族特点；6、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10]。同时马汉还对"海权(Sea power)"一词进行了两种意义上的界定，一是"经由海军优势获得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二是"生产、航运、殖民地和市场，总称之为海权"[11]。马汉的"海权"概念，本质为"为本国利益实现对海洋的控制权"[12]，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全局对海洋的控制权力"[13]。

中国的海权思想是以马汉的"海权论"作为指导和基本框架的。马汉所倡导的从军事意义的制海权为切入点的传统海权观对中国的战略制定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一味地追求建设强大的海军和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话，不仅目前没有这一实力，而且跟中国"不称霸"[14]的基本原则相悖，会引起更多国家的恐慌和敌视。因此，有必要对海权概念做更多的思考，尤其需要超越马汉的海权概念，建立与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今中国海洋空间发展相适应的

海权新思维。

**(2) 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区分**

“海权”的英文 sea power 译为“海上力量”,它与“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意义不同。马汉认为：由于海洋是一种资源，因此“海洋权利”就成了主权国家的一种“国家主权”。而权利往往是要靠力量来维护的，这便是带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在这意义上，“海上力量”是捍卫“海洋权利”的军事手段。

但是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力，主权国家又让渡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从而使海上权力具有强制力。由于“海洋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因此如未经联合国和国际法等的允许而使用就成为不合法的霸权。

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海权诉求之所以遭到周边国家的误解，理论上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的区分对外战略中的“海洋权力”和“海洋权利”。中国的海权也随中国主权同生，但却是有限海权，因此它从未超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规定的中国海洋权利的范围，海军发展也从未超出自卫范围；而且虽然不同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样的海洋权利，但由于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得到的海洋权益也并不同。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只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

**2) 中国海权现状的困境**

**(1) 海权困境—中国海权面临种种挑战**

首先，中国海军并没能有效控制第一岛链内的中国海域，反而面临着主权海域和岛屿被侵占分割的现实。此外美国频繁在我国周边海域与其盟国进行联合军演，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不能确保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意味着不仅无法解除大国海军对中国造成的海上威胁，还不能有效控制台湾海峡。而中国海权所面临的最紧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根据历史上大陆成功收复台湾的先例可以看出，解决台湾问题“制海权是军事上的关键问题”[15]。但目前中国海军实力不足以掌握台海地

区的绝对制海权。

再次，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也就保证不了邻近海域战略通道的安全，难以保障我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以 2009 年中国货轮“德新海”号于印度洋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为例，事发后，中国只能采取借助其他国家海军“分区护航”的权宜之计。一旦中国面临战争，中国海军无力打破其他国家对中国海上通道的封锁与破坏，更无法通过封锁、切断敌对势力的海上交通线等有效保护自身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因此假如中美关系交恶，美国凭借自身及亚太盟友拥有随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

**(2) 困境原因—薄弱的海上军事力量**

在马汉提出的海权六大要素中，“民族素质”是一个与其它诸要素都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重要因素。“海权论”中对“民族素质”的阐释为：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来满足在于全体公民对海上商业利益的渴望和需求，保护国家海权体系的完整。就海权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关乎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运用的战略[(16)]。也就是说海权的形成需要强大的海军力量的保护。中国正是由于海上军事力量的不足，才会在海权方面显露出种种缺失。

我们可以同周边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海军力量进行比较：拥有世界上海上综合作战能力最先进水平的力量配置的美国第七舰队控制着整个太平洋地区，从而对西太平洋形成绝对的战略优势；日本的海上武装力量拥有对周围 1000 海里范围内的海上作战及对敌攻击能力，并拥有世界一流的轻型航母、防空、反潜作战能力，攻击型核潜艇技术和建造能力，其远洋综合作战能力超过英法以及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而中国海军中的中程导弹潜射能力和少量舰载直升机，个别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常规潜艇仅仅达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际水平，岸基海军航空兵和导弹是海军防御战略的重要辅助部分。因此中国海军尚“没有现代海军防空能力”，也不具备空中、水下、水面以及陆基中远程导弹等多维攻击联合作战能力。中国海军所需担负的迫切任务与其现阶段自身力量之间极端不匹配，已经不能有效保卫中国的海洋权益。

## 5．中国海权困境的解决路径的几点思考

### 1）海权发展的军事途径

#### (1) 加强海上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海权”这一概念属于战略范畴，它是“经由海军优势获得的制海权”[17]，“没有武力保证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18]。在利用国际法来维护中国自身合法国益时，需要有强大的硬实力来支持，再完善的国际制度也“不能代替国家对自身实力的依赖”[19]。

具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要捍卫对本国领海及其他海洋战略通道的制海权，需要发展海军力量。寻求第一岛链的突破口，必须利用远洋海军力量，形成对东海、台海、南海地区的绝对制海权，并通过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或驻扎航母群，获得更广阔的海域及相对的海上制空权，形成战略威慑力。特别是海外贸易已成为我国贸易总额主体的今天，强大的海外贸易依赖安全畅通的海洋通道，而海洋通道需要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来保障。因此，中国海军的职能不能仅限于保卫边疆与近海的安全，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远洋作战能力，特别是在海盗和恐怖主义猖獗的海域，可快速呼唤战术制空权和海洋警察的帮助，及时有效地保护海洋贸易所依赖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 (2) 加强海上军事力量的战略途径

根据当前的海权发展需要，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海军远洋化的具体构想。即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海军建设成一支以现代化大型海上作战平台和核潜艇为核心的、具有全球性投射能力的、能够在世界主要海域遂行海上攻防任务和有效地保卫国家海洋利益的海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航母的建设和中国海军功能的战略转型势在必行。

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海军由近海走向远洋的标志。而建设航母战斗群将发挥出更大的作战效能，使中国海军能够具备强大的远洋能力和攻防兼备的能力，从而执行更广泛的作战任务，有效维护国家利益。航母的发展还可以推动相关国防技术和船舶制造业的进步，并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此外，建设航母还能弘扬中国的海洋文化，传播中国的文化魅力，进而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软

实力。拥有了航母群，中国的政治外交将不再只是依靠“声明“来维护海洋权益，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航空母舰还代表了一种政治力量。

海军功能的发挥和拓展是海洋防卫力量构建的另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中国把海军的运用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且主要强调其战时的作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误区。海军的功能应该是多元化的。马汉也认为海军在促进国家政治、军事、贸易、海外政策方面都能够发挥其特有的功能[20]。中国应力争建设一支具有较强的续航能力和自给力的、在世界各主要海域实施全方面威慑和作战能力的海军。在承担远洋任务的同时，还要作为海岸警卫，与国家海上执法机构一起维护主权，保护近海资源和对资源的享有、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与海上搜救，维护海上安全与良好秩序。

当然，发展必要的远洋海军力量并不是盲目地进行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要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在短期内，中国海军力求能够为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保障；而长期来看，中国海军则应达到能够保障海洋战略通道安全的水平，特别是针对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时，应具有单独有效的打击力量，而在与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行动中还应力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在与利益冲突国或潜在敌对国处于对抗或敌对状态时，中国海军应具备保护自身海上生命线的能力，但“在切断敌对国家海上生命线，给对方以威慑”后也应立即停止其他军事打击行动。

**2）海权发展的经济战略途径**

未来中国应该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全面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合理高效地开发海洋资源，建设海洋能源开发强国。

首先，由于强大的海军力量所需的巨大开支需要由通过海上贸易所获取的巨大财富来维持，繁荣的海外贸易是发展强大海军力量的最根本动力。建国后很长时期内，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在农耕社会与内向型经济社会中，无法为海军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持久动力，海军成了额外的沉重负担，导致了海军建设的落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稳固外向型经济结构。

其次，能源是实施海洋开发的首要动因，也是海权发展的物质保障。而能

源的开发离不开科技的推动和支持。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现代海洋科技，通过努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探测、油气开发、深潜等技术，加快科学开发海洋，提高开发的质量和效益。此外，建设发达港口，发展远洋渔业，也有利于促进海权的发展。现代港口不仅是一国陆海空运输的交通枢纽，也是物资和信息服务的集散中心，而当战争发生时，还可作为战略母港和后勤保障支援基地使用，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建设世界级大港。而一支现代化的大型远洋渔船队，则能够在国际海洋政治和渔业环境的变化中确保中国在世界海洋的渔权。

**3） 两大海洋战略通道的安全保障**

中国海岸线并不直接通向太平洋，而是被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等组成的第一岛链所隔断。这些群岛周围的海峡和海道成为中国进行远洋航行的必经之路，它们对于中国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目前中国主要需要确保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海洋通道防卫体系的安全，并针对不同通道的特点采取不同形式的防卫战略。

**(1) 太平洋海洋通道的防卫—（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外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大通道。随着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严重依赖这条“海上生命线”。但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却存在诸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危险。首先，大国基于权益纠纷争相控制这一地区，使得该地区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其次，该区域猖獗的海盗活动也威胁着中国的海上能源和贸易安全。而中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防卫能力不足，不能有效保障中国在该地区的海上安全和利益，从而陷入了“马六甲困局”。寻求“马六甲困局”的解决对策成为中国海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最大限度的发展海上力量，建立一支可以抗衡美国，能够获得制海权的海军。

**(2) 印度洋海洋通道的防卫**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也拥有巨大利益。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利益也十分错综复杂，加上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频繁，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十分严峻。而中国的海上力量在这个地区既没有大的影响力，而且由于地理距离遥远，海军

行动需要漫长的航行，无法对印度洋的海上突发事件作出最迅速的反应。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可以说陷入了“另一个困局”。

针对印度洋通道的这一困局，笔者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加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力度，扩大自己在印度洋的影响，提高在印度洋的军事行动能力。特别是应积极参与各大国在该地区举行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这将有利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寻求新的安全框架和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其次，针对地理上的距离，中国需要在印度洋地区建立长期性的军事存在，例如选择沿岸友好国家的港口作为持久性的维修补给点和海外军事行动的出发点，最大限度确保中国在印度洋通道的安全和利益。

## 6．从中国海洋战略看中国领土问题的解决路径

面对中国海权发展中的种种危机，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海权”意识正逐渐苏醒。从现今中国贯彻的海洋政策不难看出，中国正在不断提高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海上贸易，积极振兴和完善海军相关产业和配套措施，向现代化远洋海军的目标迈进。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争端问题时，仍然存在着主权主张不明确，略显被动的外交政策。而随着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当面对海上主权的侵犯时，中国国民希望政府“有所作为”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时就势必会产生各种矛盾。

以南海领土问题为例，首先中国的崛起招致了越来越多邻国的担心和疑虑，因此很多国家开始寻求美国的帮助，呼吁美国来制衡中国，这给中国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其次，由于各国必须在《联合国海洋公约》下提出领土诉讼，这就将中国南海边界的依据“九段线”和领土主张问题提升至国际仲裁的高度。中国不得不为自己的南海历史性水域的领土主张提出反诉，而反诉又引发了邻国对中国寻求区域霸权的猜疑。除了南海周边国家，日本和韩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南海的能源通道，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也很依赖海洋贸易和海军。所有这些国家都将中国的行为视为妨碍海洋自由通行的障碍。

而在国内，中国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在南海主权上所做的任何实际或潜在

的让步。邓小平曾经的“搁置方案”在国内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提出领土主张，招致邻国的不满甚至军事外交对峙；模糊领土主张来维护国际关系，又会激起民众的抗议。

针对这一局面，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首先中国必须改变“韬光养晦”的传统政策，转变不干涉政策。当前中国的不干涉政策已经被外界曲解为不承担责任的借口。因此应更积极地借助外交手段参与到其他国家和全球事务中，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笔者坚持“创造性介入”这一倍受争议的主张，因为“创造性介入”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去干涉别国内政，而是通过树立一种新的国际形象来帮助和团结发展中国家，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其次，积极发展多边合作关系，变被动外交为预防外交。如今，中国正在通过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寻求更多的多边关系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同时还可以防止周边一些国家向美国寻求援助共同对抗中国。中国应该在预测到潜在的冲突和危险的基础上，以更主动的姿态，特别是对待领土问题上，明确领土主张，更加积极地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安全机制。

最后，在面对北约东扩和美国与亚太军事同盟关系强化等海陆威胁的时候，中国应该转变“不结盟”的战略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去构架同盟关系，而是通过加深与与美国传统伙伴国的关系，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来瓦解那些针对中国的同盟架构及其所带来的威胁，为中国走向海洋奠定有利的地缘政治基础。

## 注

(1) 张江河 :地缘政治与战国策派考论. 吉林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 第 50 卷第 1 期.

(2) （英）H.J.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2.

(3) 吴传钧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序)》[A].[英]杰弗里·帕克 :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李亦鸣译,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2 : 1.

(4) 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 吴传钧：地缘政治学概论·序[A].载沈伟烈.地缘政治学概论[C]，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

(6) 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7) （英）H·J·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3-101

(8)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96

(9)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9-202

(10)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安常荣、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38

(11) 钮先钟：《战略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0

(12) 鞠海龙，《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

(13)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安常荣、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5

(14)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一期

(15) 倪乐雄，《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 年第一期

(16) 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30-35

(17)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安常荣、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18)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阎学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74

(19) 同上

(20) A.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50

**参考文献**

A.T. Mahan(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Geoffrey Till(2004),Seapower :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Alford Jonathan(1980), Sea Power and Influence Ol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Farnborough, Hampshire.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2007)《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 H.J.麦金德(1985) 《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英) H.J.麦金德(1965)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刘从德(1998) 《地缘政治学:历史, 方法与世界格局》,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斯皮克曼(1965)《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文木(2004)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鞠海龙(2007) 《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芙(2008)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 阎学通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Eric Grove(2004)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London: Routledge.